

互联网给教育带来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总体上也是积极的。我想强调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自主学习的能力变得异常重要，这对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对于教育，我有一个基本观点，即一切教育本质上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本质上是自学。教育的这个特性，在天才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人类文化的任何领域，一切做出了创造性贡献的人物，无不是自我教育成的，而并非学校和老师教出来的。不管在现实中有无师承，他们本质上都是自己向本领域内的大师和能者学习，并且在学生时代往往与体制化的学校教育发生冲突，是冲破了体制的阻力得以成长的。

教育的这个特性，同样也体现在一般学生身上，只是不像天才成长故事那样有戏剧性罢了。现在学校用分数评估学生的优劣，但是，走出校门之后，重新洗牌不可避免，生活实践不会在乎你在学校里分数的高低，只会检验你素质是否真正好。基本可以断定，那种具备自我教育能力的学生会胜出。所谓自我教育的能力，我是指养成了智力活动的习惯，能够在兴趣引导下自主学习。相反，一个全优生，如果只知道对付功课，只会考试，走出校门后，他的平庸会暴露无遗。

从手稿到成书

陆其国

两年前，上海曾举办过一个名为“妙笔生辉：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展”的展览，共展出入藏上图的现当代名家手稿260余件，观展者无不慨叹于能有幸目睹到这些展品，以及它们得以存世的不易。有缘得见现当代名家手稿尚且如此，要是再往前追溯，那又会是怎样的惊喜？毕竟年代越久，名人手稿存世的几率就越小，但几率小不等于无。

如出自蒲松龄亲笔的《聊斋志异》手稿，因清末社会不靖及战乱等因素，从其家乡山东淄博辗转流落到东北辽宁。最后仅存半部的《聊斋志异》手稿，终于入藏辽宁省图书馆。《聊斋志异》手稿，最早是由蒲松龄八世族孙蒲介人，为保护蒲翁手稿，于1863年携往关东。后来他将手稿传给儿子蒲英瀛。戊戌变法后，《聊斋志异》手稿不幸流失半部。蒲英瀛去世前，将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传给五子蒲文珊。孰料二十多年后遭逢土改，若不是被及时发现和果断抢救，仅存半部的《聊斋志异》手稿差点被付之一炬。如今它也就成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者手稿。正是鉴于祖辈为保护蒲翁手稿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风险，蒲文珊“为长久保障（蒲翁）手稿的安全，光大祖德，慨然同意将《蒲翁》手稿交由国家保管”。半部弥足珍贵的《聊斋志异》手稿，已然具有文献和文物价值，不再轻易示人，一般读者自然无缘得见。这类手稿，得见是意外，未见属正常。

由名家手稿，忽然让人想起名家著书。书由稿成，无稿何来书，这是常识。比如同样是古典文学名著的《红楼梦》，就没有《聊斋志异》那样的幸运，成书后还得以留存作者手稿，哪怕只是半部。此中不易，首先凸显的，就是保护和保存作者手稿的诸般艰辛和不易。我收藏有近代名人林则徐著《徐则徐奏稿》（全三册）、《林则徐集·日记》、《林则徐书简》（杨国桢编）、《林文忠公政书》、《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等，现在翻阅这些书，我首先想的已不再是我当初得到它们时的不易，而是想着它们从手稿到成书的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毫无疑问，这其中手稿留存必然占第一，这是基础，舍此无他。但像林则徐这些著作得以问世，仅知道有手稿显然不够，还得经历搜罗、收集，包括搜集后的甄别、研究、整理、出版等一系列过程。就以《林则徐书札手迹选》来说，它的成书就源自林则徐后人保存的其中一部分原稿。林则徐玄孙林维和曾撰文披露，林则徐手札原件不下九十余件，部分系林则徐谪戍新疆三年中亲笔起草；部分是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为幕僚起草，后经林则徐亲笔修饰。这些手稿多用绵纸缮写，纸质很黄。林则徐共有四子三女，三子林聪彝随成新疆。这部分信件手稿即由他精心保存，尔后代代相传，视为家珍。林维和记得，他童年时在北京，遇到军阀混战，他父亲蔚章公就把这些手稿藏到东交民巷外国银行保险库。后来他到香港工作，手稿又被他带到香港，历经劫难，终得幸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将手稿交由北京中华书局。不料书还未及全部整理好出版，十年动乱又起……所幸它们劫后犹存，才有了今天读者看到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林则徐的手稿，曾星散在那些收信人（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后人）手中，也是经过国家专业人员搜求、征集，然后使这部分手稿入藏故宫博物院，因此得到很好保护，最后终于得以成书问世。由此可知，像这样的名人手稿成书，其中艰辛，尽在不言中。

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人会有作为，没有这个能力的人往往平庸，这从来是规律，而在互联网时代会表现得更加鲜明。互联网的最大好处，是信息资源发达和共享，可以便捷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但是，要享受这个好处，前提是你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方向，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具备相当的鉴别能力，能够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否则的话，网络信息如潮水般涌来，你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这些信息与你的生活和心灵毫无关系，不是促成反而是败坏了你的心智生长，你只是成了海量信息的一个通道。事实上，现在许多人就处于这种状态。所以，互联网的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对于有自我教育能力的人，它为学习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如果本来不具备这个能力，在信息流的强制作用下，这个能力就更无从培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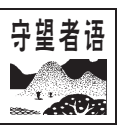
互联网与自我教育

周国平

我认为，真正应该考虑的不是用网课取代实体教学，而是如何改革实体教学，使它成为教育新生态中良性的基础环节。现在的学校教育，从教育理念到课程设置、测试方式、评价体系，都是唯应试导向，完全是阻碍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从小学到中学，课程划一，课业繁重，分数至上，学生始终在为应试打拼。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区别只在承受力的大小和对付得好坏。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终于大功告成，大量学生在学习上不再有进取心。自主学习的前提是对学习有兴趣，我们从开端就败坏了这个前提。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多半会成为失败者。

情还暴露了网课的不足。第一，网课缺乏实体教学的现场感和亲密性，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有现场互动和情绪交流，教师看着学生的眼睛讲课，与面对屏幕讲课，讲者和听者的感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孩子自制力弱，听网课远不如在课堂上专心，效果较差，因此许多学校在复课后只好把网课的内容重新教一遍。所以，至少在基础教育阶段，课堂仍然必须是教学的主要场所。

我认为，真正应该考虑的不是用网课取代实体教学，而是如何改革实体教学，使它成为教育新生态中良性的基础环节。现在的学校教育，从教育理念到课程设置、测试方式、评价体系，都是唯应试导向，完全是阻碍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从小学到中学，课程划一，课业繁重，分数至上，学生始终在为应试打拼。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是一件痛苦的事，区别只在承受力的大小和对付得好坏。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终于大功告成，大量学生在学习上不再有进取心。自主学习的前提是对学习有兴趣，我们从开端就败坏了这个前提。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多半会成为失败者。



华椿和华樟兄弟，是我的伯父和叔父，可是他们永远定格在韶华。华椿为国捐躯78年，华樟今年牺牲80年整。华椿小学没有读完就到一家绸布店学生意。1936年11月，华椿在报纸上看到“七君子事件”的消息，他联络了3个好友从江都邵伯镇转道来到上海，找到由七君子成员主创的进步书店——生活书店，表达4个苏北青年对七君子的同情和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年方22岁的华椿立志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他瞒着家人，准备徒步到延安。可是，国民党首都所在地江苏省军警密布、关卡重重，连徒步走出江苏省都十分困难，他的计划破灭。

1938年的一天，华椿所在的绸布店被日本飞机击中，成为一片火海。失去饭碗的华椿，瞒着父母投奔了江都抗日自卫支队，随后编入新四军。第二年，华椿找到华椿，坚决要求参加新四军。在华椿的介绍下，17岁的华樟于1939年加入了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

1941年，华樟担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连指导员。有一天，华椿与两个战士奉命在季家市（今江苏省靖江市季家市镇）张贴抗日标语，不幸为日寇俘获。日寇残忍地拷打华樟，要他供出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的驻地，华樟坚不吐实，凶残的日寇竟将华樟分尸八块，将其头颅悬于季家市镇示众、身体全部抛入湖中。这一年，华樟刚刚19岁。

1943年11月一天的黄昏，新四军七师沿江支队桐东大队在桐东（今安徽省枞阳县）与国民党176师527团突然遭遇，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恶仗。华椿这时担任桐东大队教导员，率领的

一个连只有100多人。敌军527团有700多人，装备精良，双方力量十分悬殊。这一仗从日暮一直打到第二天近中午时分，我军由于背水作战，又无后援，战斗异常惨烈。连长傅培元和连指导员杨雨环先后牺牲。华椿率领战士们顽强抵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华椿这一年28岁。

叔父和伯父相隔2年先后为国捐躯，弟弟19岁，哥哥28岁。如果不是那一场战争，兄弟俩应当正在享受岁月静好、岁月如歌的日子吧！

1952年的一天，民政局通知祖母，告诉她两个儿子华椿、华樟都为国捐躯了，祖母成为扬州市当时唯一的烈士家属。家人当时的希望是寻找烈士的遗体，可是华樟尸骨无存，华椿被告知牺牲在安徽如西，而遍寻安徽地图，却没有如西这么一个地方。民政局告知，如果有衣冠，可以为他们建衣冠冢。家人当时犯了难，因为华椿、华樟兄弟俩自参加革命后，从来没有回过家，十几年过去，家里竟然寻不到他们生前的任何东西。

民政局为建烈士陵园，要求家人提供照片。家人找到一张华椿十七八岁时的照片，至于华樟，只找到一张全家福，那时的华樟只有3岁。民政局找了一个画师，让他将3岁的华樟画成19岁的模样。今天在扬州烈士纪念馆见到的华椿、华樟照片，华椿应当像如其人，而华樟是画师推测的形象。

1967年，扬州市政府在扬州烈士陵园为华椿、华樟建立了纪念碑。遗憾的是，80年过去了，兄弟俩的墓碑下依然空无一物。

华樟如果健在，今年是99岁。上海新四军研究会100岁左右的老人有40余位，如果他知道总书记关心新四军老战士，给新四军百岁老战士回信，他该多么高兴和激动呀！今天的中国大地春色满园关不住，可以告慰伯父和叔父的在天之灵了。

平安喜乐

（中国画）

马伟彪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玉玲珑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一句很明显地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这个忧伤是对春天的一种惋惜，春光易老，时光流逝。下面两句画风一转，顿觉明丽动人，“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画面太过明艳”，以至于蒋捷博得了个樱桃进士的美誉。

樱桃与芭蕉是初夏的风物，春天的时候到园子里去看芭蕉，天气清寒，芭蕉还未抽出新叶，只有去年的枯叶散落了一地，也无人收，如今已抽出了宽大的翠叶，碧纱一般临风而立。

芭蕉新绿的时候，正是樱桃红熟的时候，阳光下红玛瑙一般的樱桃点缀在翠叶之间，闪闪发光，人还未食，先引得鸟儿啄食，酸酸甜甜的樱桃入口，无异于玉液琼浆。摘下一盘今夏的新樱桃，用白瓷盘子盛了，不吃单只放着就觉得水灵好看。每逢季节转换，我都要换上一张新的头像，春天的时候我的头像是窗前的一丛梅花，如今换成了碧纱窗下的一只风铃，从窗前的梅花到帘下的清风，绿色成为夏天的主色调，青苔碧草，还有窗外翠绿的树叶，深深浅浅，浓浓淡淡，一直蔓延到云天之外，水是绿的，风是绿的，映上人的眼眸都是绿的。

多媒体艺术为舞台增添时代活力

代晓蓉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今天走过了一个甲子，它记录了上海音乐舞蹈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近些年，数字多媒体技术逐步在本土剧场艺术领域得到应用，人们从上海的舞台上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数字化剧场艺术作品。

作为一名多媒体设计者，我有幸站在中国数字化剧场艺术快速发展的当口，拥抱着这个国度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期待着与各领域的艺术家一起为文化传统赋予时代的生机，展现这个时代艺术样式和人文风貌。怀着这样的愿望，我和众多优秀艺术家一起，为上海之春的舞台奉上多媒体剧场艺术作品。2016年5月，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与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携手编创的大型音舞诗画剧《木卡姆印象》，出现在第33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创作中，我们在尽力呈现木卡姆艺术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将表现维吾尔族民间流浪艺人阿希克在大漠深处吟唱木卡姆的纪录片植入舞台表演，电影与戏剧的混剪，在相互观照和相互映射中丰富了剧场艺术的视听语言，拓展了创作空间。还有写意化多媒体设计思路与写实性舞台场景的结合，都使木卡姆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

2019年，多媒体音乐剧场《东去西来》结缘上海之春。全场多个作品均采用跨界融合的表现方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东方艺术精神与西方现代演绎相结合的新命题。复古的龟兹音乐与未来主义风格视觉影像相结合；云南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与全息影像相结合；长调呼麦、作曲家自制打击乐器与抽象的影像空间设计相结合；侗族大歌与剧场多媒体设计相结合。东方与西方、民间与学院、复古与时尚，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交汇重构，体现了实验性剧场艺术在这方面的不断探索。

数字多媒体的介入拓展了舞台边界和创作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艺术样式会更加丰富多彩，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也会在此间不断实现对话和精神交流，上海之春的舞台也会更加异彩纷呈。经典银幕荧屏共产党员形象，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明起刊登一组《影视中的共产党员》。

十日谈

乐满上海之春

责编：吴南瑶